

毛泽东与农村调查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

陆学艺 徐逢贤

本文由四部分组成：①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光辉实践；②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实践对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历史性贡献；③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理论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历史性贡献；④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指导意义。

作者：陆学艺，男，193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徐逢贤，男，193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光辉实践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从事农村调查研究的开拓者，他所进行的农村社会调查，其内容之广泛，时间之长久，规模之宏大，思想之深刻，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的。他不但自己坚持作农村调查，身体力行，为广大党员和干部作表率，而且一贯倡导和组织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形成工作制度。他既注重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又重视对调查成果和实践经验进行理论研究和概括。他不仅写了许多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农村调查材料，为研究和认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指导，而且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农村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方法和态度，给人们留下了关于农村调查研究的极为宝贵和丰富的理论财富。

（一）青年时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活动

1917年暑假，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采用“游学”的方式，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农村计时一个多月，行程九百多华里，进行了广泛的农村社会调查，向农民宣传民主革命的道理。

1918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起，在洞庭湖边的浏阳、沅江等县农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调查，并在调查过程中，鼓励农民联合起来同地主豪绅作斗争，摆脱贫困的处境。

参加革命后，毛泽东更是把农村调查作为了解国情的重要途径。1920年，他在深入农村调查后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这对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为他创立农村调查的科学理论作了必要准备。在他仔细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后，确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而为他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传

播马克思主义并为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二）北伐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调查活动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党和军队的缔造者之一，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阶级状况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许多重要的农村调查报告及论著。

北伐战争期间，他经常深入农村、城镇、工矿，考察农民和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毛泽东在深入农村调查后指出：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特别重要”，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否则“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1927年毛泽东亲自深入湖南的长沙、湘潭、衡山、湘乡、醴陵五县农村，步行一千四百余里，作了长达32天的实地调查，在全面调查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基础上，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调查农村，研究农民运动的开端。

北伐战争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开辟了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随后，毛泽东率领红军部队对罗霄山脉的自然条件、经济、政治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工作，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总结了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于1928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井冈山的斗争》，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主客观因素，又强调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是旧中国特殊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文章强调要研究中国革命斗争的特殊规律，要注意国家和民族的特点。

在土地革命过程中，红军所到之处，普遍燃起了土地革命的烈火，创建了兴国、于都、宁都、寻乌等县的革命政权，建立了赤卫队。毛泽东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作了细致的调查，通过解剖农村各个阶级，得出了正确的阶级估量，提出了划分阶级的标准，从而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土地革命的正确进行。

为了同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导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从思想理论上进一步宣传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多年从事和提倡调查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党内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历史总结。毛泽东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了“离开实际调查就会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进而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这里，毛泽东已把认清国情和革命胜利问题联系起来，批判了党内和红军中严重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倾向，并阐明了调查工作的目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创立的标志。

继之，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活动，通过农村调查他得出结论：要消灭旧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吃人制度”，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农民群众结成联盟，“进行革命”。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掌握中国国情，制定一系列的正确战略决策及各项方针，引导革命取得

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工农革命战争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在革命战争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者，不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出发，全盘否定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正确理论，否定毛泽东关于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行一条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所谓组织城市武装暴动的“新原则”。结果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力红军被迫突围长征。在长征途中，党中央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战争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二次伟大转折。从此，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走向胜利的基础，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一面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一面从事大量理论研究工作，在以往调查研究获得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方针和任务。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科学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经验，特别是反“围剿”作战的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使之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这篇著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又一光辉文献，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已形成了科学的体系。

（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活动

陕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毛泽东为了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端正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党同志充分认识调查研究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对我党自成立以来，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农村调查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总结，于1941年正式出版了《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以及《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并领导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等中央文件。毛泽东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从转变党的思想作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高度，系统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把农村调查研究的经验体会和具体方法从理论上加以科学的概括，使调查研究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使我党的调查研究理论更加完备和系统。

1937年发表的《论持久战》就是毛泽东对抗战初期中国国情的一次深入具体的历史的辩证剖析。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不仅在科学的历史性分析基础上制定了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而且以历史实践为证据，论证了农村调查研究，对于认识国情和取得革命成功的内在的必然联系。

为此，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展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以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不正之风，推动了革命事业蓬勃的发展。

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并号召解放区人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认为这是人民群众取得解放和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毛泽东根据革命实践和农村调查掌握的各种情况，论述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及相应的经济政策，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和中国人民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这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解决当时的中国问题指明了前途。

（四）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实践

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战略决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又进一步得到了推广和深化。毛泽东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重要著作，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纲领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战术及根本方针。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了党委会必须做到“胸中有数”的思想，使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更为精确化了，对客观事物的数量界限没有基本的统计，没有主要的百分比，就没有科学的分析。这样的调查研究也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把握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性，也就没有正确的政策。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次会议上作了报告，他在长期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中国国情，提出了建国后的基本方针，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指明了基本方向和主要途径。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实践，总的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建国初期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以及在1961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党中央曾多次提出和阐述了调查研究对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反复号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继承和发扬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多次巡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调查了解各地农村的情况，倾听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意见，并领导和组织了全党同志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纠正了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克服困难，取得了各方面的伟大成就。

毛泽东根据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的实际情况，对农村调查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进一步强调了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深刻阐述了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三者间的关系，反对各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从而深化、丰富和发展了他的调查研究理论。令人惋惜的是，在毛泽东晚年的实践活动中，他的这些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未能贯彻到底，在某些方面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导致毛泽东对某些问题（如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党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了某些重大失误。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978年底党中央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开始扭转。在此之后，毛泽东生前倡导的调查研究的优良的传统作风重又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毛泽东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寻求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二、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实践对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实践，对开创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确立和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历史表明，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农村阶级分析和土地革命、农民问题、对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等方面提出的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都是建立在对农村社会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毛泽东思想及其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理论等也都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通过对农村社会实际进行系统周密调查研究而概括总结出来的。没有深入中国农村社会的调查研究，就谈不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可能形成和发展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和政策，也就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旧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关系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因此，农村调查的实质就是整个中国社会调查的缩影，了解了中国农村，也就了解了中国社会的本质。

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同样，也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依据。为此，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也是从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的。其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在总结与概括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完整地指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了近代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同盟军以及革命的前途等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就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②

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中进行的，这里是各种矛盾的焦点。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等同志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组织领导了初期的农民运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虽然这些运动不断的受到军阀、地主的摧残和镇压，但是，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农民运动就逐渐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

在全国革命高涨和农民运动普遍兴起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革命的进攻。革命队伍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基础上，于1926年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谁是我们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6页。

^② 本文着重号“……”是作者所加。

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它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他明确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毛泽东经过对各阶级的具体分析，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贫农和其它半无产阶级、中农和其它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是无产阶级的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在这里，毛泽东在总结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论证了中国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揭示了由贫农、雇农、中农所构成的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伟大力量，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的最忠实的可靠同盟军。这就使无产阶级找到了能够支持自己革命的一种伟大力量，有了农民这个同盟军，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表明了毛泽东关于结成工农联盟的伟大思想。同时也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我们党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

（二）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在批驳以戴季陶主义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时指出：“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在这里，毛泽东指明了在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局面下，中国革命已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前途，而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前途。毛泽东还从分析中国历史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指出：在近代中国许多爱国的志士仁人曾经企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促进中国的进步，摆脱贫穷落后挨打的局面。可是，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行不通。因为，在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中，封建的土地关系一直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先后相继的统治政权无不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基础，并极力维护封建土地关系。在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国社会虽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绞尽脑汁要使中国沦为殖民地，但它终究没有实现这个梦想，这是因为在广大中国人民中蕴藏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力量，这个力量是任何势力都摧不垮的；另外帝国主义想独占或几国“瓜分”中国，势必引起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激烈冲突，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宁愿保持中国的现状，各自按照自己的需要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利益均占，共同主宰中国的命运，并在中国造成一个为他们服务的官僚买办阶级，实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近代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被动挨打，之所以不能从封建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历史经验表明，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和命运，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根本的问题在于要有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毛泽东的上述理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符合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是被后来中国革命

的实践一再证明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而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新贡献。

(三) 指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问题，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1927年3月，毛泽东总结了自党成立以来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指出：广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没有农民起来在乡村中打翻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中国民主革命就不会成功。

毛泽东在分析了农民各个阶层后指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并热情的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对于农民革命的态度如何，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的试金石，也是党内马列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分水岭。号召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去领导农民。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农民这一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不致落空，中国革命也才有胜利的可能。

毛泽东还指出：农民问题，实质上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实现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事业，只有同广大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结成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而农民也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解放自己。因此，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如何领导农民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的问题。是如何引导，联合和依靠农民同盟军这一伟大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并不断改造农民，使其逐步提高到无产阶级觉悟水平，为逐步消灭工农差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从领导民主革命起，到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历史过程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

(四) 提出了“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的正确论断，并制定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

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夺取国家政权中的同盟军问题。无产阶级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群众中去领导他们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从而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

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在《对农民宣言》中指出：农民问题的内容就是贫农问题，贫农的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当时农民参加革命的迫切要求就是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因此，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建立农村的革命民主政权”。指出“土地革命是巩固工农联盟所必需的”。因此，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就必须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并引导农民为实现这一纲领而斗争。

土地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消灭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开辟道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毛泽东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和对农村各阶级进行分析后，制定了一条“依靠贫农和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革命路线。

这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为党在当时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胜利地领导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五) 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从而取得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武装革命道路

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行动和他在1928—1930年所做的农村调查的理论研究，深刻地说明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的条件下，革命发展的道路乃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逐步地扩大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从而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的道路。

在1928年以后中国南部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红军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的连续粉碎，大大地扩大了红色区域在全国和全世界的影响，并使红色区域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中心，推动了全国革命走向高潮。所有这一切，生动地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走武装革命道路理论的正确性。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理论，奠定了党正确地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完整的理论基础。

(六) 毛泽东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

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必须把组织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工作的第一位，以解决根据地最主要的粮食问题和日用品的原料问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寇残酷进攻，国民党严密封锁，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遇到极大的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号召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坚持了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广大农民在这一号召下，组织起来发展农业及其它生产，彻底粉碎了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的命题。他说：“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关于农业问题的思想又有了光辉的发展。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后又提出发展国民经济要“按农、轻、重次序安排”。1959年，毛泽东又进一步对无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提出了“加速发展农业是高速度按比例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并提出了“加速农业技术改造”的任务。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根据我国的建设经验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根本方针，这一方针符合马克思

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原理，正确地反映了国民经济两个最重要部门之间的最本质的内在联系，这一方针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它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客观经济规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掌握，从而成为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一条重要方针。

（七）毛泽东指明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为了解放生产力。”也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他说：“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从而回答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体现在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和富裕人民生活。也就是社会主义必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标准，而生产力发展又要体现在实际经济效益的提高上。1963年9月，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964年12月，毛泽东又教导全党全国人民“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为从根本上彻底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大力发展生产力，“至少需要几十年时间”。

（八）毛泽东在总结农村调查情况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①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

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两种制度作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作斗争，谁胜谁负，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按照我们八大所说的，应该说基本上分了胜负，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并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就是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兴盛起来，变为一个工业国”。

毛泽东不仅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教育广大干部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不要把社会主义想象得那么好，变成不切合实际的空想。1957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有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生产关系，用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去进行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好起来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1961年，毛泽东在同来华访问的英国朋友蒙哥马利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但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毛泽东又说，“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这些论述都说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是十分清醒的，他要求人们也要正确地客观地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国情。

(九) 毛泽东在深入农村调查，总结农民群众生产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号召中国农业走“科技兴农、集约经营”的路子

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指出：“我国按人口平均耕地面积较少，但已耕地的增产潜力很大”。号召全党在抓农业问题时，应“十分重视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和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并把这一精神贯彻于《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去。

1958年毛泽东在江苏南京、浙江杭州、辽宁沈阳、吉林长春、河南封丘应举农业生产社和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长葛县“五四”农业社等地，同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科技工作者调查研究后，系统总结了农民增产的经验，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指明了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的基本途径和前提条件是不断的、逐步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深刻揭示了我国农业“走集约经营”的路子的道理。为了正确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毛泽东为此作了科学的说明，指出“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各项措施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孤立地采取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收到应有的增产效果，必须根据“农业八字宪法”的内在联系，全面贯彻、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使得各项措施都能协调发挥作用，起到综合增产效果，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走依靠科技、“集约经营”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通过广大农民和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使我国占世界耕地7%的条件下，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2%以上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的奇迹，是毛泽东“以农业为基础”思想的又一胜利。

(十) 指明了中国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并为之而奋斗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毛泽东早在1933年“长冈乡”和“才溪乡”的农村调查时就发现，农民“成立了劳动互助社和耕地队，使劳动力有组织地调剂，这种生产形式，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并称赞他们是“两个模范乡”，号召农民“要学习长冈乡和才溪乡”。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号召，使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互助合作化运动更加广泛地发展起来。1943年，毛泽东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在各解放区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生产有了发展。但是农民的小私有土地所有制经济，对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力有极大的局限性，决定了中国农业发展必须把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联合成为合作经济。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农村调查的实践，在领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明确地提出自愿互利原则，采取了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第一步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

① 《毛泽东选集》第885页。

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组织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这些步骤和形式，使农民逐渐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后来，又逐步发展成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由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内实行了“一大二公”、“统的过死”、“一平二调”等经营管理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渐趋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首先实行改革，在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形式，实行统分结合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找到了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合作制经营形式，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指引的中国农业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为之实践并不断探索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十一) 毛泽东谆谆教导我们：没有对中国农村的调查研究，就没有我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没有我们正确的战略战术，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以极其尖锐泼辣的笔调和鲜明的战斗风格，深刻揭露了教条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及其对革命的危害性；批评了党内一部分人安于现状，不求甚解，墨守陈规，迷信‘本本’，不深入农村社会实际调查研究的倾向。

毛泽东把深入农村社会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联系起来，这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在同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始终坚持了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正确的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许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不断地把革命和建设事业引向胜利。

三、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在深入农村调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学习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仍感到十分新鲜和解渴。这些理论著作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和工作作风，是永放光辉的，仍然是指导我们进行农村调查研究实践的指南。

毛泽东对于调查研究理论的历史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和了解中国国情的基本方法，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桥梁，了解情况是正确领导的基础，是党制定正确政策的依据

毛泽东指出，真正好的领导，必须经常地、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我们党制定正确的政策，需要以事实作为依据；同样在执行党的政策时，也要以所了解的实际情况作为立足点。毛泽东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改造我们的学习》）。只有认识世界，才能改造世界，而要认识世界，调查研究乃是最基本的方法。

为了正确地认识世界，毛泽东强调要做到“胸中有数”，“对事物的发展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毛泽东把调查研究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实践领域，作为指导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改造世界的革命斗争的重要方法时，从认识论的高度论证了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是形成我们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前提，指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这是他多年从事和倡导的实际调查工作的深切体会和理论概括，以后又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生动表述，说明调查研究已不仅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1941年，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的几篇文章中，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1963年5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问题。这些论述把调查研究的意义提高到过去从未有过的理论高度。

毛泽东之所以努力向全党号召把调查研究作为了解下层情况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其原因在于我们党担负着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任务。要胜利完成这一任务，就要求全党必须了解基本国情，掌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农村、深入社会进行持久的调查研究，只有掌握了实际情况的第一手材料，才能使党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桥梁或中介，是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首要环节。毛泽东正是从这个高度确立了调查研究在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路线中的重要地位。这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基础上，对调查研究理论的深化作出的贡献。

第二，指导调查研究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群众路线方法

把阶级分析方法和群众路线方法运用于调查研究实践，这是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根本特征之一。毛泽东强调了阶级分析方法在调查研究中的意义时指出：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二个出发点。对于负责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的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方法”。可以这样说，阶级分析方法贯穿于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始终。尽管他在晚年陷入了“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失误，但阶级分析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目前仍然是我们党考察国际国内形势而制定基本国策的指导原则之一。只要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对立，阶级分析方法将永远放射着它的光辉。

同阶级分析方法相联系，毛泽东反复强调要以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进行调查研究。这既是思想方法，也是工作方法，也是考察干部对调查研究工作态度的一个重要标准。毛泽东认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从认识论上说，实际上是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调查研究和党的群众路线在认识论基本上的一致性。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指导党的具体工作，使调查研究成为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的光辉典范。

第三，搞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正确态度是实事求是和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

为了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首先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端正调查研究工作的态度：一是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系统周密的调查找出事物内部的规律性；二是要有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兴趣，而不是

“昂首望天”。因为只有深入农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有可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其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要采取“恭谨勤劳”的态度和工农群众交朋友，群众才能讲真话，进而才能掌握真实情况。否则，难免会陷入“走马观花”、一知半解、粗枝大叶的境地。

我们党的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什么时候能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农村社会调查研究，什么时候就呈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谐融洽，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高，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就具有感召力，我们国家就会出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一旦我们党和干部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农村调查研究，就会发生失误，腐败现象就会滋生，革命和建设事业必然受挫，党的凝聚力就会减弱。

第四，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重要环节，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改造人的世界观的基本途径

中国共产党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东方大国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关键在于能不能制定和执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能否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是确保党的正确领导，引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调查研究既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也是党的作风问题。毛泽东不仅充分肯定调查研究在认识社会、改造客观世界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从改造共产党人的主观世界，增强党性，转变党的作风，加强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去充分肯定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这样就从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两个方面，十分鲜明地、具体地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肯定了调查研究在认识论中的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达到更系统、成熟的新高度。

第五，丰富了调查研究方法的内容，指明了调查研究的基本形式是开调查会，基本方法是“典型调查”

毛泽东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们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在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实践活动中，他很善于开调查会，且总结出带规律性的理论。在1935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就以调查的技术为题，对如何开调查会讲了七点。其基本思想可概括为：开调查会要亲自拟定调查提纲，深入到一个地方就一个问题找熟悉明了社会经济状况的人，进行讨论式调查，要亲自作记录，“假手于人是不行的”。这是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经验的第一次总结。到1941年写《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时，进一步概括为：“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毛泽东则从搜集材料的方法角度强调开调查会的几个关键环节：调查会不仅要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调查的典型可分为三种：即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要亲自收集和整理材料，抓住重点。材料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即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利用典型材料分析问题的具体方法，形成了一整套开调查会的程序、内容和方法。在今天仍不失为各级干部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获取信息资料的手段日益现代化，调查研究已具有广泛的意义。但是，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达到科学决策的水平，要实现密切同群众联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的目的，学会开调查会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和形式。

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有很多方法，但是最基本的还是作典型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中，很多就是运用典型调查。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号召全党各级领导干部，为了了解农业问题，掌握规律，以便制定正确的农村政策，“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去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毛泽东十分强调“下马观花”，深入基层蹲点。《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都是采用典型调查这种方法。他说：“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的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他把这种调查方法，形象的比喻为“解剖麻雀”。解剖透了一个麻雀，对于了解其他麻雀，甚至了解其他鸟类也就容易了。

四、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实践及理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指导意义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转变。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党又重新恢复和发扬了深入农村、深入社会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制定新时期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过程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理论。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仍然需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以开创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一）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我们党在建国后，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科学论断，它指明了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阶段。它具有以下特征：

- ① 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离落后的阶段；
- ② 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的阶段；
- ③ 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
- ④ 是通过不断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阶段；
- ⑤ 是全国人民奋起艰苦创业，逐步实现现代化的阶段。

这就从历史任务、历史地位、发展方向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发展的性质和特征，从而也决定了我国农村经济方面的特点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以按劳分配为基本原则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在共同富裕前提下，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勤

奋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等。

上述特征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所说的落后，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而是有特定历史内容的落后，就是生产力不发达，没有实现现代化。这个落后，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带来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在逐步摆脱，但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摆脱的落后。

为了改变这一状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必须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而在解决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过程中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改革开放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党为了发展生产力，改变我国落后的面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先后在农村和城市开展了经济体制改革，解放思想，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坚持深入农村、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的前提下取得的，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取得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取得的。离开了这点，改革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标。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的性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和两个基本点，并为此制定各种具体的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的最基本的根据和出发点。

（二）农民问题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问题

农民问题不仅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教导我们“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也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

“摸清摸准国情”首先要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摸清中国农村的情况、中国农民的情况、中国农业的情况，这是制定我们国策的基本出发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国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我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仍然是11亿多人口，8亿多农民，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高，资源相对缺乏。在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中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情况复杂，困难很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经济规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要解决11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农业的头等大事，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政治稳定的基础。而要解决这个问题，8亿多农民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因此我们制定基本国策的着眼点，都必须考虑到调动这8亿多农民的积极性，正确处理好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以保证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离开了农业、离开了农民积极性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顺利发展的，新时期的工农联盟也是不会巩固和发展的，我们的政策就必然会发生失误，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不可能实现。

（三）要学习毛泽东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群众的实践中去作周密细致调查研究的作风，并将其应用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去

历史事实表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深入农村社会作调查研究，对农村的情况明确，党

制定的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就正确，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顺利发展；反之，不作农村调查，不分析中国国情，而从抽象的原则和教条出发，对农业形势判断失误，制定出的政策就必然失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受挫折、受损失，甚至遭到失败。

近年来，我们一些搞农村工作的同志，深入农村搞调查的意识淡薄了。有些人整天坐在机关，苦思冥想出主意；有些人蹲在城市里东游西逛搞“采访”；有的虽然下“农村”，却整天蹲在县委招待所听汇报、看材料；有的坐着汽车，这儿停停，那儿跑跑，蜻蜓点水，一天跑上几个县，就是不向农民群众作调查，不到农村实际作调查。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严重存在。

为了正确的指导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思想，只有深入农村实际、深入农民群众中去调查研究，详细的掌握各种必要的材料，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从而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去指导农村，指导农业，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夺取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四）学习毛泽东蹲点作典型调查，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继续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有很多方法，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农村最基本最可靠的还是蹲点作典型调查。蹲点典型调查是由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引伸出来的一种科学方法，同时也是党和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积累下来的、行之有效的调查方法之一，是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体现，在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仍然是一种了解农村，了解农民的最好的方法。

蹲点典型调查能作到深入农村实际，深入农民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并能亲身体验农村的实际生活，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获得真实可靠的材料，它既可以研究物，也可以研究人，可以将人与物、经济与技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调查研究。也就是毛泽东提倡的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来进行农村调查研究。那种认为蹲点进行典型调查的方法已经过时的说法，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农村调查研究的环境、任务、目的、内容的变化，我们也不能只局限于典型调查一种方法，而应当根据调查任务和要求的不同，分别采取或同时并用其他一些调查方法，如抽样调查、重点调查、普查、问卷调查等。把微观调查和宏观调查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以便更广泛、更迅速、更准确地收集和整理各种事实材料和统计数据。同时还应当吸取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的研究成果，加强对调查研究项目和内容的科学论证，使农村调查进行得更为周密和完备。近年来，农村调查研究的实践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农村调查的社会化、现代化、精确化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明显，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经验、新特点、新趋势。我们应当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和要求，用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来充实和发展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以便更好地发挥农村调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五）在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更要深入农村、深入农民中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农村改革10多年来，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8亿多中国农民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

还在继续迅速地发生着变化。随着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去做研究解决。如：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在集体经济组织系统的服务功能薄弱的地区，农户分散经营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承受能力极为有限，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近年来，农户不断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农副产品一多就出现“卖难”，一少就发生“大战”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农民在商品经济中仍然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状态，随市场变化调节农业生产的经营能力极其脆弱。又如单纯家庭经营还给国家计划管理造成困难，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大宗农产品将会长期处于短缺状态，通过价值规律调节供求的余地十分狭小。还有如私营企业的出现，一方面起拾遗补缺的作用，对发展商品经济有利；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主剥削雇工阶层创造的剩余价值量愈来愈大，社会矛盾渐趋尖锐。即使在农民阶级内部分配不公的现象也日益明显。农民负担过重，“打白条”或变相“打白条”现象屡禁不止，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如何建立等等，都需要我们像毛泽东当年所要求的那样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作为我们指导农村工作的依据。只有在全党继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农村实际，深入8亿农民群众中去，摸清国情，我们才能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共同做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这篇大文章，进而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六）在农村调查基础上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认真解决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学习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理论，就要继续发扬毛泽东亲自倡导的有的放矢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杜绝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学风。深入农村、深入农民调查研究，就是为了下决心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应当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通过党中央的反复倡导和教育，在领导干部中，深入农村，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调查研究农村现实问题的同志越来越多了，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在党中央的领导组织下，通过农村调查比较圆满地解决了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正确地提出了“九十年代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是：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稳定和完善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力量，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方针政策。

但是，由于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泛滥，一些人提出了在农村实行“私有化”的错误主张。这些人确实沾染了不少坏习气，弄虚作假，主观主义学风横行，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狂热鼓吹私有化，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坏影响。这种主观主义的学风、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有害于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当年毛泽东曾将那种无的放矢的主观主义学风斥之为是共产党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今天，对于这些不良学风，我们同样应当如此看待。

总之，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党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毛泽东同志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成功地实现这种结合，关键在于深入农村、深入社会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掌握中国的国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的特点，从而制定出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正确

路线、方针和政策。反之，如果忽视或离开农村和社会的调查研究，或者没有进行认真正确的调查研究，就会在党的工作指导上发生失误，使革命和建设遭到挫折和失败。今天，我们重温党的历史，重新学习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实践及其理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深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继续深入农村、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国情，并按照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指出的“十二条”基本原则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探索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及其具体表现，用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就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调查研究理论也必将随着新的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推向前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结论。

责任编辑：王 颖

· 文摘 ·

社会学在科学上的地位

《社会学刊》^① 1929年第1卷第1期上李剑华的文章指出，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上的年纪最小，当他在1938年出世的时候，环顾周围已布满了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科学。他因为要寻一安身立命之地，无往而不与一切既成的科学冲突。既成科学认为科学为社会学留下而未取去的材料一点都没有。比方说社会学有关于原始民族偶有意见发表，于是攻击者说，这是侵犯人类学和人种学的范围……如此，从旁的科学家看来，社会学不过拿一种滑头的方法，侵占人家的地盘，以图钩名沽誉的一种似是而非的科学，又不过搜集比社会学更重要的各种科学所舍弃的破铜烂铁。

作者认为，拿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叫做社会科学。社会现象是浑一的现象。当观察这浑一的社会现象时，因观察者的主导观念不同而抽出社会现象的各方面。于是而有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等科学的不同。社会学的主导观念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中有结合的要素，有分离的要素，前者叫做结合的社会关系，后者叫做分离的社会关系。结合是社会的常态而分离是社会的变态。

社会学以社会关系为研究的主导观念；与政治学之以权力为主导观念；法律学之以权利为主导观念；伦理学之以善恶为主导观念等，事无不同，我们承认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是一种社会科学，就不可不承认社会学是一种社会科学。

^① 《社会学刊》（季刊），1929年创刊。第1卷是1928年成立的东南社会学社的主要刊物，主编孙本文。第2卷起改为中国社会学社的主要刊物，主编仍是孙本文。共出6卷。